

试论方豪的宗教史研究

修彩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上海 200062)

提 要 方豪在宗教史研究方面颇具成就,其研究以天主教史为主,《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其重要成果之一。在详考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原因以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同时,又对回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来宗教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并对浙江诸外来宗教重点考察,开宗教区域研究之先例。他还注意拓展宗教史史料来源,对宗教史研究,有发扬光大之功。

关键词 方豪 宗教史 天主教 其他宗教 史料来源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3)01-44-4

方豪(1910—1980)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天主教神父。他学问精深,治学严谨,在宗教史等学科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其宗教史研究的范围,除他本身所属的天主教史外,还涉及回教、摩尼教、犹太教、火祆教、佛教等的历史。对陈垣先生开辟的宗教史研究,有发扬光大的贡献。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史家,大陆上却无人对其进行专题研究,本文就其丰富著述,对其在宗教史领域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和特点及其在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探讨。

(一)天主教史研究

方豪长期从事宗教活动,并精通英、法语,熟悉拉丁文,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有着精湛的研究,对天主教耶稣会来华的经过、活动及影响的研究尤为精深。其有关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辑)和《方豪文录》。方豪宗教史研究的特点和成就便集中通过这些著作反映出来。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是一部人物传记集。该书以中国天主教史上有关人物作为叙述中心,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史以人类,人以史传,基本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从人物的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教会的活动情形,实为一部中国天主教史。

首先,方书虽为列传,实重“史”字。无论是从书名、选材到整部书的结构安排,无不体现这一特点。方豪在序言中,对其书名有一解释:“我之所以取名《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而不取名《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可见我重在‘史’字。”^[1]

从全书来看,书中所列人物,以记其成就为主,除少数以传记形式记述其生平事迹外,大多并不以传记形式出现,而是着重叙述这一人物最能反映其所处时代天主教历史特征的事迹,或其对教史的主要贡献。通过这些事迹或贡献,将天主教史中重大史实按时序列出,以展示整个中国天主教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如对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书中便选择了与“礼仪之争”有密切关系的多罗、嘉乐、德理格三人分别列传,以三人为线索,对其起因、经过、结局、影响详加介绍,使读者通过三人的传,便可对这一标志天主教史上重大转折的历史性事件有一完整的了解。

在结构上,方书一改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每人分列一传的单一形式,往往采用合传。费书中冈明我、徐日昇和安多三人各列一传,方氏则以他们共同参与过清朝对俄外交工作,都曾护驾出关、都知天文历法而将他们列为一传。此外如永历宫中王太后、马太后、王后及王子慈烜均为信教人士;白晋、傅圣泽二人,都以奉康熙之命研究《易经》而出名;各被合为一传。合传的采用不仅丰富了形式,使整部书变得活泛起来,更主要的是它比单传更能集中体现人物的主要事迹,更易展示中国教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主要特征,从而将整个中国天主教史的发展过程基本勾画出来。

其次,所列人物范围广泛。方著三册,共收305人。从传说中的圣多默宗徒到现代的徐诚斌主教,既有艾儒略等成就显赫者,更注意到下层的小人物与教友。

方书列传重在以对天主教有所贡献为原则，“凡是对中国天主教史有重要关系的人”^[2]无不包罗在内。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历来被西方天主教界视为异端，方氏大胆冲破了这种传统观念，不但将景教徒阿罗本、景净、阿罗憾，也里可温教徒马薛里吉思、马祖常、阔里吉思等人列入传中，而且将传说中的圣多默宗徒也列入传中。马可波罗从未从事过传教工作，方氏以其《游记》中有关天主教的史料十分丰富而将其收入，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天主教史的贡献。郭弼恩、杜赫德二人虽都未到过中国，但二人所编《耶稣会士书翰集》和《中华帝国及中国属领鞑靼之地理、历史、纪年政治与自然界全志》，“对于中国传教史和欧洲的汉学研究，都有重大贡献”^[3]，而被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力阐扬利玛窦等辉煌人物贡献的同时，方豪对那些在传教史上默默无闻而又作出贡献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及教友，也予以充分的注意。其书下册所收即大部分为雍正至道光时期教难的殉难者，和同治以前秘密攻读神学的神职人员。他们的事迹都不太多，或只存姓氏，方氏认为他们对教会“前仆后继，亘百余年而不绝”^[4]，而将他们列入传中，其中很多人是他首次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些未被利用过的清宫档案中发掘出来的。方书又突破了以前教史传记多以记主教、神父为主，很少述及教友的局限，将成就卓越的教友也收录其中。书中还列出许多他认为是教友且有待于考证的人。上述处理显示了方豪目光的过人之处，为这些人物立传，其意义不单是为清代的传教史、教难史提供了稀见的史料，而且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天主教下层及教外活动的状况。而被称为“浙江奇士”的祝石，以及在教中争议颇大的丁魁楚等特例的收入，更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增加了全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为后人研究教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方氏潜心于宗教史研究，对其研究目的体味尤深。“有史则传，无史则绝，史之重要如是也。”^[5]1947年，将其早年有关天主教史的论文，汇成《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全书共集论文13篇。1948年5月，北平上智编译馆出版《方豪文集》，共收论文39篇，系集《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和《中国天主教史论丛》中重要篇目加以修改整理而成，多有关西方教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中引用大量西文书册及教会人士著作，均为一手资料，足可印证中国宗教史的若干问题，为当时人所未闻者。

历史上，基督教曾三次传入中国，方氏对其传入、发展阶段和进程、特点及影响等均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历来争议较大的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颇有见地。他将景教的涵义分为广、狭两种，从广义涵义出发，方氏认为天主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景教说比较合理，公元七世纪以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虽有阿诺皮乌斯、科斯马斯等人的记载，但均为片断，且不十分确实，因此不可信。并据慕尔所著《一五五〇年前中国基督教史》所载，对耶稣宗徒圣多默曾到中国传教一事加以考定，认为“其文献出世甚晚，纯为后人所传”^[6]，可信度不大。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中国的天主教与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是一脉相承的，不能跳过景教史和也里可温教史而空谈中国天主教史。

同时，他又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对这两个时期与明代天主教的传入特点加以比较，指出：“明季天主教之传入中国，为一完全创新之局势，与唐宋时代之景教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毫无联系。”^[7]与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相比，明末天主教的传入带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即为东亚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机会上与东亚其他地区也大略相同。认为明季天主教东来是由天主教自身的改革、新航路的发现等原因所致，从而否定了流行于史学界的明末天主教东传是由于新教兴起后，其在欧洲丧失地区与教友颇多，因此欲在欧洲以外努力扩张所致一说。而将日本人对中国的崇拜直接影响到沙勿略，以及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推崇也作为当时天主教东传的主要原因，为天主教传播史研究的一全新观点，这种观点也是方氏重“大关系”中“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体现。

对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盛行的原因，方豪也作了重点剖析，提出了著名的“适应”说：一种宗教要从其发源地传到其他地方去，“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8]即“适应”。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明末清初入华诸宗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各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之所以有的发展顺利，有的则很快消失，除了政治及一些短期因素以外，关键是否能适应中国儒家学说。明末清初中国的天主教活动之所以能极盛一时，主要是由于中国天主教人士所作的“适应儒家”运动所致。但这种适应仅限于学术思想方面，不是势力上的“依托”，与唐代天宝和开元年间道教依托摩尼教、宋代摩尼教又转而依托道教、佛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上述这些分析，把宗教史放到大的文化史的范畴下来加以审视，对其适应机制加以探讨，既是他倡导“东西文化平等”、以求中国文化与外来思想相融合的表现，也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二）其他宗教史研究

方豪的宗教史研究，涉及领域颇广，除天主教史外，对唐宋以来传入中国的其他外来宗教如回教、摩尼教、犹太教、火祆教等也有所研究，并颇有造诣。其中研究较深、成就较大的是回教和摩尼教史的研究。

作为外来宗教，回教和摩尼教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唐、宋、元三代曾极盛一时，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方氏结合大的背景对它们传入的时间、历代的分布情况、兴盛与衰落的原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等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阐释了困扰学界已久的许多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回教何时开始传入中国的问题，自来说法不一。通过对诸种说法的分别考证，他认为

陈垣先生所主张的唐永徽二年说比较合理。其对蒲寿庚的考论,也很具代表性。在宋元时代,回教蕃客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蒲寿庚。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曾著《蒲寿庚事迹》一书,研究颇深,推定蒲寿庚为阿拉伯人。方氏则引岳柯《程史》和郑所南《心史》中有关记载加以考定,认为南蕃即占城,蒲寿庚为占城人而非阿拉伯人。在论述中,对蒲寿庚的事迹阐发颇多。

又如其有关摩尼教的研究,与陈垣先生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相比虽有逊色,但他在参考陈著、法国沙畹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文献的基础上,又辅之以大量的拉丁文文献,对某些问题颇有见解。对摩尼教两次遭禁断的原因的分析便是一例。他认为摩尼教自始至终与政治有关,天宝以前与波斯、吐火罗有关,至德以后则与回鹘势力有密切联系。传入中国后这种关系仍然维持,并与中国政治也发生联系。“中国摩尼之或许奉行,教友之热诚与冷淡,教堂之被封,无不与回鹘有关。”^[9]正是这种政治上与回鹘密不可分的联系,使中国摩尼教“挟回鹘之势而盛,亦因回鹘之弱而衰”^[10],并最终导致了会昌二年及五年的禁教。这些分析与论证,揭示了摩尼教之消长与政治的联系,是颇有见地的。

方豪对浙江的外来宗教有着特殊的兴趣。在《浙江外来宗教史略》中,他分列天主教、回教、景教、犹太教、摩尼教等专题,对其重点研究。他详细地考释了浙江天主教史的渊源、分期等重要问题。通过对历代浙江天主教兴衰原因进行分析,充分肯定了方济各会士和德理、郭居静、金尼阁等人在传教过程中的作用。对浙江回教的研究,方氏用力极深,他自己也曾颇为自负:“浙江之回教”一文,因此文经过几次修正,不少创获,自认为尚值得留之后世。”^[11]文中对杭州的回教古墓、礼拜司及回回桥、宁波、嘉定回教寺的地址和建筑年代,及回回人来浙江之渊源详加考证,并对浙江回教史上有很大影响的瞻思、丁鹤年、吉雅摸丁人等加以研究。通过对以上回教事迹与人物的考究,方氏认为,“浙江之回教最早或始于元时”^[12],对其传承系统作了钩稽整理。他对浙江犹太教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其传入原因和时间的考证上。通过对杭州也里可温寺何时兴建、何人所建、寺属何教、何时始废、遗址何在、寺名何意等问题的考定,阐述了浙江景教的兴衰历程。他对浙江的摩尼教也作了研究,认为摩尼教虽因回鹘帝国的崩溃而遭禁断,但因其教义与中国阴历旧说相符,因此在浙江与佛、道二教相托延至清代。方氏的这些研究,首次勾画了整个浙江明清两代宗教史的发展状况,展示了各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以前,除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著作中涉及到对浙江宗教个别问题的考述外,还没有人对某一区域的宗教情况进行较系统的考察。因此,可以说他对浙江以来宗教的研究,实开区域宗教史研究之先,开辟了宗教史区域研究的新路径。

方氏身为天主教神父,但在宗教史的研究中,始终能站在史家的立场上,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既不抬高自己本身所属的天主教,也不任意贬低其它宗教,并能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当时各教之间的相互争夺、相互诋毁。摩尼教自传入中国始,便遭到佛教的攻击,有关的记载往往多循佛教文献为诋毁之语。方氏则力图以客观的态度对其加以分析。他认为《佛祖统纪》有关摩尼教的“此魔教邪法,愚民易于渐染”的记载是佛教对摩尼教的诋毁,并从反面得出“适足以见摩尼之盛”的结论。对于《僧史略》载摩尼教的“佛为洗足”以及“此法诱人,直到地狱,慎之哉!”他也直言指出:“此为佛教诋毁摩尼之言,然适足以证摩尼之发达,否则,比丘何至改宗”^[13]为贬低摩尼教的地位,一般记载均谓其信徒是下层之人,方氏则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和《渭南文集》以及《唐会要》等有关记载,指出其信徒并不尽属于低级者,信其教者不仅有秀才、吏人、士兵,更有象黄仲清之类的能诗博学者。这就为人们正确认识摩尼教的社会基础提供了另一侧面。

从总体来看,在宗教史研究中,方豪对各派的态度确实是比较客观的。对佛教、回教、摩尼教和犹太教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影响,均能予以充分的肯定,对各教的一些主要人物的贡献,也予以客观的评价和介绍。并敢于指出天主教尤其是他本身所属的耶稣会的不足与缺陷。不可否认,作为天主教神父,方氏在研究时不可能不带上自己的宗教意向,流露出对他本身所属天主教的夸奖。但作为一名宗教人士,能对自己所属之外的其他宗教作出如此客观的评价,已实属不易。

(三) 宗教史史料来源的拓展

方豪注重史料,强调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的意义。在他看来,只有不囿于旧有的材料,努力开拓新史料,力求发现前人未曾涉及的新材料,才能使学术研究有坚实的基础和新的生机。在研究宗教史的过程中,他引用了大量的资料,来拓展其研究的史料来源。

首先,他引用了大量的教内史料。身为天主教神父,又精通拉丁文和法文,方氏研究天主教史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查阅大量的教会内部资料,这是非教内人士所无法比拟的。而在教会史料中,尤重国外教会史料的搜集与运用。梵蒂冈神学图书馆和罗马传信部档案室为非教内人士难以接触,所藏资料便更加宝贵。他充分利用其神父优势,对这两处及罗马国家图书馆、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等地所藏资料进行挖掘,解决了宗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如对清代康熙年间,罗马教庭三次派使来华的时间、经过和影响的考察,便是依据仅存于罗马传信部档案室的汉文原始资料进行的。

对于西欧以外其它国家所藏的教内史料,他同样予以重视。他认为研究基督教历史,还“应从卧亚、巴达维亚、麻六甲、马尼拉、长崎等处去搜求资料”^[14]。经他对明万历年间马尼拉刊印书籍的搜索与考订,发现此类木刻书现知其名者有九种,有五种尚存于世,除一种为西班牙与达伽洛(Tagalog)文外,其余四种均为中文,散藏于马德里、维也纳、梵蒂冈和莱顿四处。这些

资料的发现与运用,为宗教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资源,极为研究者所重视。

其次,注重教外史料的运用。在广泛搜集教内史料的同时,方氏对教外史料也非常关注。他认为:对某些宗教事件,当时“教外人记者,较教会更多、更详。”^[15]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也引用了大量的教外史料。如在《中西交通史》中,便引用了杨光先《不得已》、王朝式《罪言》、黄贞《辟天主教书》、万斯同《明乐府》及全祖望《鲒埼亭集》中的有关材料,来说明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规模之大与影响之深。

在教外史料中,方氏对反天主教人士的言论尤为重视,认为“这类的历史价值更高”^[16]。以对利马窦的评价为例,他认为教中人对于利氏贡献及博学的称赞,“出诸教中人之口,难博人信”^[17],而反天主教派的言化“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利氏极端宣扬”^[18]。因此,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便大量引用李玉庭的《诛邪显据录》,以见利氏的博学多闻;引林启陆的《诛夷论》,说明利氏在华影响及名气之大;引林光、邹元标《愿学集》,以反证利氏沟通天主教与儒家之成功。指出所有这些出于反天主教人之口的言论,是证明利氏在华传教成功的“绝好史料”^[19]。

第三,擅于从家谱中挖掘天主教史料。家谱内容丰富,“凡民族之渊源、家世之迁徙、人寿之短修、生殖之强弱、遗传之优劣、天灾之演变”,均可由此求之。但由于历代“少人笃嗜”及“谱状自身不振所致”,因此应用不广,其史料价值也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方豪认为:“方志为国史所依据,家乘又为方志之雏形,治史者能不注意及此乎?”^[20]对家谱在整个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予以肯定,尤重家谱中天主教史料的研究。并以玉山吴、徐二家谱中之教会史料为例,对家谱中教会史料的价值、范围、特征及其应用作了详细的论述。

家谱中教会史料之所以重要,他论析主要由五方面原因所致。指出家谱中教会史料的范围,主要包括遗像、教中人之纂修员、教中人所撰的序跋等。据其名、字、别号、职司、姻亲与墓地等,可考察族中有无教友及奉教年代,钩稽教中人的传记、碑文及族人所赠的匾额、联对、寿序、诗词等;同时又可弄清当时教会的盛衰以及教友的优劣状况,并可通过这些资料窥见当时传教的方法及遭遇之困厄。家谱虽不易获得,且其中的教会史料也不丰富,但方氏认为“教友之家谱,颇多特征”^[21],如教会的司铎、修士、修女以及会长,常有特加著录以为荣者;有领洗名、安葬圣地等。并指出应用家谱教会史料所应注意的十个问题。如果说陈垣先生撰《休宁金声传》,引其文集中《城南叶氏四续谱序》以证金声为天主教徒,开引用家谱中宗教史料之先例,那么,方氏则对此加以发扬并使之系统化,其所阐释的有关原则、注意事项及其实践,则为后来研究者发现并引用家谱中的宗教史料起了示范作用,其功不可没。

总之,方豪在宗教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史料搜集之宏富、视野之开阔、态度之求实,在整个宗教史研究领域非常突出。他在20世纪30—50年代所搜集的大量资料,特别是西方传教士的文献资料,至今仍为研究宗教史的重要依据。其所提出的若干原则和方法,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

方豪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系统研究了诸外来宗教入华史事,注意把诸宗派的流布放在中国社会史的范畴中进行考察,拓展了宗教史的研究领域。其论著及相关研究,对天主教传入我国后的资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而且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研究天主教史的最重要参考资料。他对天主教以外其他宗教的研究,则丰富了陈垣先生所开创的宗教史研究的内容,使整个宗教史研究趋于完备。因此,他对宗教史研究自有发扬光大之功。所有这些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自新会陈援庵先生外,无出其右者”^[22]的地位。

注释:

- [1][2][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写在前面(上)》[B],中华书局1998:2
 [3]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B],中华书局1988:71
 [5]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甲集目次识言》[Z],上海商务出版社1947
 [6][7][9][13][15]方豪:《中西交通史》[F],长沙岳麓书社1988:413,968,407,404,981
 [8][12][21]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C],台湾学生书局1969:203,505,918
 [10]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Z],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204
 [11]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C],台湾学生书局1969:2945
 [14]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C],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524页。
 [16][17][18][19][20]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B],中华书局1988:78,75,77,77,77
 [22]方豪:《徐光启·方豪小传》,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

责任编辑 王羊勾

试论方豪的宗教史研究

作者: [修彩波](#)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上海, 200062](#)
刊名: [贵州文史丛刊](#)
英文刊名: [GUIZHOU HISTORICAL STUDIES](#)
年, 卷(期): 2003, ""(1)
被引用次数: 2次

相似文献(2条)

1. 期刊论文 [修彩波](#) 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 史学理论研究2003, ""(3)
方豪(1910-1980)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天主教神父。他学问精深、治学严谨,精通拉丁文、法文,尤矢志专治史学,造诣甚高。在中西交通史、宗教史、宋史和台湾史等学科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本文主要对其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学术成就、特点及其在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探讨。
2. 会议论文 [萧凤娴](#) 历史、交通、宣教—方豪红学研究 2004
本文以“历史”、“交通”、“宣教”为视域,讨论方豪的红学论述。“历史”、“交通”是方豪理解、诠释《红楼梦》的方法论,“宣教”是方豪理解、诠释《红楼梦》的主题。即方豪透过历史、中西交通史方法论,来建构以宣教为中心的《红楼梦》阅读成果;本文即是探讨此一阅读模式的建构及其思想根源。本文从以下方面论述:
一、兴教与兴学的史学家。
二、《红楼梦》:清朝历史与故事小说。
三、辨史与皈依:宗教史家的责任与情感。
四、“天主教传华史”的《红楼梦》。
五、“基督与中国”的宗教中国。

引证文献(2条)

1. [徐文华](#) [徐宗泽的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5
2. [修彩波](#) [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学位论文]博士 2004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zwsck20030101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c7bc75e7-3338-479b-9542-9e4d0082a3a4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